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二三九期 ——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z k 0 0 1 1 b)

- | | |
|-----------------------------|-----|
| 【自由论坛】义和团运动蒙昧性的文化根源 | |
| 及其对“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之二) | 王 毅 |
| 【史海钩沉】一起荒唐的“蜗牛事件”，中国人晚看五年彩电 | 李中强 |
| “红卫兵绑架李井泉”始末 | 何 蜀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华夏文摘》增刊资讯。

【自由论坛】

义和团运动蒙昧性的文化根源及其对“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之二)

• 王 毅 •

(续上期)

义和团运动对本土宗教的动员程度和范围，比历代造反运动中类似的动员要广泛强烈得多，这种情况除了再一次说明中国民间信仰中隐伏着巨大的、随时可供激活和膨胀成席卷全社会狂潮的宗教资源，而且尤其证明：人们对图腾和庇护神的崇奉程度，必然是与他们受到“魔鬼”的压迫程度和他们横扫牛鬼蛇神的热望程度成正比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无限崇拜”的狂潮之中，原本相当程度上以“不语怪、力、乱、神”为圭臬的士大夫阶层，亦几乎完全为其所左右：〔79〕

义和团既遍京师，朝贵崇奉者十之七八，大学士徐桐、尚书崇绮等信仰尤笃。……御史徐道昆奏曰：“洪均老祖已命五龙守大沽，夷船当尽没。御史陈嘉言，自云得关壮缪（王毅注：即关羽）帛书，言夷当自灭。闻以澜公将夜间玉皇降世一事，陈进于太后之前；□公爷与民团设坛之时，玉皇出显神团一事，颇蒙嘉奖，老佛甚喜之。言以垂拱元年，经玉皇降世一次，实系吉祥之兆，中国大有得救之望。当是时，上书言神怪者以百数，王公邸第，百司廨署，皆令拳匪设坛，厚其供亿，谓之保护。”

这种情况也立刻使人联想起五、六十年之后，成千上万不同程度受过现代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与亿万国民一起投入无限崇拜“红太阳”和“群众运动”时的笃诚和热情。“文革”时期，曾经在义和团运动的掀起过滔天宗教狂潮的文化机制，再一次最充份地展示了它无比巨大的“魔力”。从表面上看，1949年以后，人们对包括民间宗教在内的几乎一切宗教文化实施了极为彻底的扫荡，然而一个民族在几千年中日积月累、从未间断的宗教传统（尤其是心理传统），是不可能短短十几年间、在广大社会基本保留着传统生产方式的情况下被清除掉的。所以，“文革”时“扫除一切害人虫”、“打到帝、修、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等对魔鬼的讨伐既然是以历史上空前猛烈程度而爆发的，那么它对至上的、“战无不胜”的神性之狂热渴求程度，也必然是历史上空前的。与义和团运动的佞神狂潮所不同的仅仅是：由于关帝、玉帝、真武、八仙等等传统宗教的无数表层载体在1949年以后的不复存在，所以社会文化体系中重新被急遽激活的宗教需求和崇拜热情，就只有通过当时唯一的信仰渠道才能够得到满足，这就是“万物生长靠太阳”。“文革”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所以会以古今宗教史上空前猛烈的程度爆发出来（较之义和团运动时的“市中香货为之一空”更为变本加厉的是，“文革”时无数可以用来制造圣像和“红海洋”的材料几乎统统为之一空），原因之一就是：近代以来中国本土文化在列强和西方文化压迫下郁积的上述宗教需求，既极少为现代文明所改造消解，又在1949年以后被强力束缚在一个比中国的多神崇拜更为狭蹙的渠道之中。

与上述崇神狂潮相一致的是：人们出于对牛鬼蛇神“战无不胜”的宗教热望，而对一切具有神性的巫术方法狂热崇奉。前文提到的将西方人诅咒为猪、羊，并且用残酷的语汇模拟对之的杀戮仅是其中一法：〔80〕

武卫军人人佩符，盖以神道事之。……其法上体后刀剑不入，是乃南方巫师之数。……而神其数者遂谓枪炮不伤，又谓能咒禁枪炮。……初起时即遍贴揭帖，定五月廿三日将西什库、交民巷洋人杀尽，廿四大雨，天下太平；一再展期。或改东交民巷为切洋鸡鸣街，玉（御）河桥为断洋桥；名号越出越多……

洋人谓之鬼，洋钱谓之鬼钞，洋炮谓之鬼銃，……铁路轨道谓之铁蜈蚣，……改“洋”字为“洋十火”，其意盖谓水火交攻也；改“清”字为“才十清”，其意盖谓扶清也。

当时流行的诸如此类诅咒、厌口等巫术方法数不胜数。而1949年以后，政治舆论在不得不对之加以极有限的批评时，仍然把叙述的重点，放在宣扬这些行为方式所体现的“爱国主义”上：〔81〕

团民都是纯粹的工农子弟，……宣称：“妇女若诚心修道，就可以成仙升天，过海杀洋人。”又说：“天山神仙洞开了，神仙满天飞。”……老年妇女们手持笤帚疙瘩和菜刀，嘴里念着：“先剃脑袋后剃脖，剃的‘毛子’死乾淨。”到十字路口焚纸香诅咒洋人的死亡。每天晚上，大师兄分给每户黑豆七个，念了咒，让各家把黑豆放在锅里倒上水煮，这样就把洋人的魂聚来煮死，可以听到洋人在锅里吱吱的叫。综合以上情况看来，男女老少都已行动起来，热烈地参加了这个反帝运动。一方面显示迷信愚昧，一方面显示了伟大的爱国精神。

因此，许多这类巫术方法在后来的“文革”中被如法炮制（例如红卫兵与义和团一样，拔光受害者的头发、用秽物污涂“牛鬼蛇神”的人身和住宅，以及将地名等改为“反帝路”、“反修路”、“反帝医院”、“反修医院”等等），就都是顺理成章的。

第三，狂热的群众运动方式、以及这种狂热的社会文化氛围和宗教文化氛围，

与人们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之间的相互塑造。

我们知道，在原始文化的基础上，整个社会经常把狂热的“群众运动”（例如集体打鬼仪式、对图腾的集体崇拜活动）作为神圣无比、人人必须彻底投身其中的行为方式；以及这种“举国若狂”的运动形式又必然反过来给人们的原始信仰以巨大有力的强化。在义和团运动中，原始文化的内在机制最猛烈、最全面地表现出它的上述运行逻辑。由此而在国民信仰和国民心理中留下的文化积淀，当然会对后来的“文革”产生极为直接的影响。

戚本禹旌扬义和团是一场最热烈浩大的“群众运动”，这当然是对其文化性质非常准确的定义。那么，作为群众运动热潮的义和团运动又有哪些最显著的运行特点呢？我们说，它至少包括以下重要的方面：

几乎全社会的一切成员都被卷入这举国若狂的潮流之中而丝毫不能自主，他们不仅唯有投身其中才能获得生存的可能，而且只有在这趋之若鹜中才能够举手投足，否则就几乎完全丧失了起码的行为能力。在关于义和团的文献之中，我们可以看到无数这类记述：（82）

各处喧嚷烧香灭鬼子，人人附和接应，一口同音，众声鼎沸，魂梦皆□，前三门外各街巷土匪，借团民烧杀之际，乘间抢夺，毫无畏惧，……各处众口传言某处着了，某人全家被杀了，或喊嚷东交民巷洋楼着了，到处齐嚷“烧香灭鬼子”。一人喊叫，众人接声，时刻不安。……哄传西什库教堂大楼被焚。各处男女老幼，人人鼓舞欢欣，随声附和，……义和团内传出，令住户铺户门前各用红布书写“红天宝剑”四字，贴于门头之上。一时各街巷传遍，大家小户无不遵循。……义和团坛内，传出乩语一张，云由山东总坛传来，其略云：洪均老祖降坛曰：……家家不论男女老少，用红布包头，烧香三遍，……如若不遵，牛郎不能降坛，亦不能救众人之难。……如动烟火，避不住洋人枪炮。如有不遵，必受洋人之害。……西四牌楼南北与西华门内外数万团民，势如蚁聚，远望红巾蒙首，红布兜胸，遍地鲜红，血光照耀，其凶杀气象惨目惊心。

晚间看街兵传信，言东交民巷跑红旗，家家磕头烧香。如此一言，同寅诸人（王毅注：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中的官员们），均往义和坛烧香。

京城居民，日日谣言，东交民巷鬼子府被火焚烧一事，动辄倾城往观，举国若狂。……十四日午后，南横街居民忽闻有人大呼“泼水”，一时无论何人无不争往，取水泼之门外，街市尽湿。事后互相骇怪，亦不自知其故。……朱批略云：“京城上至王府，下至小民，无非义和团者”。

这种在原始信仰基础上，“群众运动”中全民性的无比狂热从人人都是义和团、“遍地鲜红”、家家拜神，到万口传谣、争相蚁附、莫名其妙的一窝蜂等一切一切行为方式，都是人们重又在后来的“文革”中最熟悉不过的。

这种强悍热烈、具有无比巨大神性的社会氛围对人们行为方式、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塑造，当然是极端强制性的，例如：

（人力车出行）车中必蒙红被，妇女尤必蔽以红布或红巾幂首，否则指为污秽而杀之。男子出行者，襟前各挂红布数寸，以示信（拳）匪。

义和拳起山东，……愚民无知，加额翘足，相望神奇，不数月蔓延遍直隶全境。习此术者设坛焚表，烧香念咒一遍，……如中疯如患魔。……始谓“扶清灭洋”，大张旗鼓，仇视教民；继则结党营私，敲诈钱财，借图报复。……一村不习此术

，则斥为黑村；一人不习此术，则诬为教民。

凡焚烧之法，众团民面向东南躬身，口诵咒语四句，立能请神附身，名曰“上法”。……各举点着高香一股，在欲烧之房前跪齐，即旁站看热闹之人亦令下跪，有不遵者即为奉（洋）教之人，人故不敢抗违。……如有救火者，即指为奉教之人同党，立刻擒捉处死。

义和团坛内传出，令街巷铺户住户，每晚门前各点红灯笼一盏，违者按“二毛子”治罪，登时各处遵行。

（义和团揭帖云）关圣帝君降坛曰：“万里香烟扑面来，义和团中得道仙，…传一张（王毅注：指义和团揭帖）免一身之灾，传十张免一家之灾。见者不传，若为幌（谎）言，为神大怒，必要加灾。

全社会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必须严格遵循“群众运动”规定的方式，否则就将立即受到神圣而严厉的惩罚，这口依靠庇护神和“群众运动”的无比神威而对社会行为方式的强制性整合塑造，是我们在后来的“文革”中最熟悉不过的。所以那时极为流行的口号就是：“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不革命就是反革命！”“要革命的站出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以及《造反歌》中所谓“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83）等等更严酷的规范。

在上述具有强大神性的“群众运动”的之中，人们思维方式的极端单向性也就是必然的。即如义和团所宣扬的：“满天星斗与妖孽，生灵到底归何处，只见明灯路一条！”（84）“前有鬼，后有妖，……若问太平日，（义和团）小将才过寿阳桥。”（85）

由于整个世界充满了牛鬼蛇神的威胁，所以尽管无数的人们对“群众运动”抱以深深的怀疑，但是他们是却只能迫使自己相信它的神威：“京中各色义和团，不下数万，有真能为的，不过百余人耳，其余皆混饭吃者，否则既无赖之极，然又不能不信。”（86）我们知道，东北亚人信奉的萨满教特别尊崇北斗星神，原因即在于他们经常处于可怕的漫漫长夜包围之中，“失去它，人们就无法生活下去。”（87）与之相似，不论义和团运动如何最强烈地表现出它的蒙昧性，但是无数的人们对它还是“不能不信”，其原因也就在于“前有鬼，后有妖”这巨大而充满“巫魅性”的压迫。及至后来“文革”时，千百万红卫兵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黑夜里想你有方向，迷路时想你心里明”的颂歌去“横扫牛鬼蛇神”，无数的人们则只能拥护、欢呼、加倍热忱地投身于这狂潮、而决没有任何选择其它道路的可能，其原因仍然在于亿万人再一次完全陷于“牛鬼蛇神”的包围之中。

充满神性而又调动起全民信仰狂热的“群众运动”，其社会效应当然是极为诱人而又无比神奇的。例如义和团运动中的景观：

（山西巡抚）毓贤六百里加紧一奏：请将玉泉山昆明湖水用法（术）升高，灌入西什库教堂，以毙洋人之类。

……谓洋船来者宽广数里，大师兄一指，炮皆反击，船尽沉。日本长街五十里，皆为红灯照所焚；各国义和团并起，（洋人）皆自顾不暇，必不能远涉重洋。

匪党妄称已遣神将出洋，往西洋扫灭各国。

（义和团）于所供关圣、观音位前设一水碗，陈列各种器械，皆庙宇神像手持木造器械，如关圣之青龙刀，悟空之金箍棒，桓侯之鞭，镇江之斧，韦驮之降魔杵，罗汉之戏龙珠、伏虎圈等。……晚间教头于地画一圈，令奉教者立其中，裹红巾，紧闭双目，首念观音口身咒，次念关神拳咒，……自谓某神下降，所作态度酷肖某神，即素来笨拙无比者，一时灵动异常，是谓降神。……各庙宇神着衣冠及持器具悉为伊等盗去，……谓其得之，以御刀枪，虽外洋火器不足惧也。……有穿神袍、戴神帽、持神械及持罗汉堂泥塑龙虎者，有以竹笼提二家猫者（据称是神龙神虎，能大能小，要吃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要咬洋人及读洋书者）。愚蠢可怜之状，目不忍睹。

义和团、大跃进、红卫兵等一切神性的笼罩下的“群众运动”，其参加者越是充满了自我牺牲的热忱、越是激发出超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其结果就越加只能是“愚蠢之状，目不忍睹”。这种必然性的逻辑原因即在于：在此类“群众运动”中，人们越是为了“战无不胜”、“横扫牛鬼蛇神”，就越是必须加倍把“红太阳”、群体狂热性等等所蕴涵的原始性神圣基因激活、释放出来；而这样一来，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就越加彻底地背离了文明社会的理性原则。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因为上述“群众运动”是在秉承原始的文化精神和背离理性原则的基础上急遽膨胀起来的，所以这种狂潮对于国民心理的建设性培育，就只能是极为巨大的戕害。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两个最怵目的例子：

当团匪起时，痛恨洋物，犯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枝、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罗稷臣星使之弟熙禄，自河南赴津省视家属，有洋书两箱，不忍割爱，途次被匪系于树下，过者辄斫，匪刀极钝，口转不死，仰天大号，（团民）顾以为乐，……其痛恨洋物如此。今（王毅注：指八国联军入京以后）乃大异：西人破帽只靴、垢衣穷裤，必表出之。矮檐白板，好署洋文，草楷杂糅拼切舛错，用以自附于洋，昂头掀膺，翘若自喜。嗟吾北民，岂知人世有羞耻事邪！

（天）津有董姓者富户也，曾有一大师兄入宅，持刀吓之。董焚香顶礼，始免。后于城破之日，路遇此大师兄执小白旗，上书“大日本顺民”。董问大师兄此旗何用？大师兄曰：“我但求活一天是一天。”……曩者为拳匪者，今多自称奉（洋）教，恫吓愚弱，诬指曰：“尔是拳匪，将扭送外国衙门。”愚弱者惧而赂之，即免，又顾而之他。（88）

天津陷，残（拳）匪争解巾带，……且多有迎降引导者。向者目洋人为大毛子，至是咸尊以洋大人。排外之风变而媚外，盖自此始。

联军入都之时，顺民旗帜，遍悬门巷，……迨内城、外城各地为十一国分划驻守后，不数月间，凡十一国之公使馆、十一国之警察署、十一国之安民公所，其中金碧辉煌，皆吾民所贡献之万民匾联衣伞，歌功颂德之词，洋洋盈耳，若真出于至诚者。直令人睹之，且愤且愧，不知涕泪之何从也。又顺治门外一带，为德军驻守地，其街巷内新设各店牌号，大都士大夫之命名，有曰“德兴”、有曰“德盛”、有曰“德昌”、有曰“德永”、有曰“德丰”、“德厚”、“长德”等，甚至不相连属之字，而亦强以“德”字冠其首。种种媚外之名词，指不胜数。而英、美、日、意诸界，亦莫不皆然。（89）

而这种在经历了政治神话和民族神话急遽膨胀与最终幻灭的二重奏之后，人们普遍对一切昔日无上崇高的圣物之逆反与厌倦，也同样是我们在“文革”之后再一次最强烈地感受到的。（90）

第四，在神圣的名义下，对各种异端的狂热搜觅与残酷屠戮。

在充满原始神性的社会文化体系之中，人们必然极其狂热地把剿灭一切危害神明的牛鬼蛇神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也就是说，原始宗教的“二元模式”不仅表现在神明和魔鬼“两条路线”（借用“文革”流行语）之间的根本对立上，而且也同时表现在：二者对立的程度和世人横扫牛鬼蛇神的狂热程度，必是与神明的伟大程度成正比的。原始宗教的这一基本原则在义和团运动中再一次强烈地表现出来，这就使得60年后“文革”捕风捉影地“深挖牛鬼蛇神”的狂热“群众运动”，有了一个可资比较的生动参照。

义和团运动继承了上述原始宗教基本原则的典型表现，在于它将伟大神明的神性及其现实载体（即旨在誓死捍卫神明、又亲得神明降世附体的“群众运动”）急速膨胀的同时，也将牛鬼蛇神及其帮凶的魔影加以无限的放大：

中国猪教极多，心变猪羊，面犹人面，譬如豺狼窟穴于几席之下，蜈蚣卵育于襟袖之中，……限三日勒令改悔：悉将耶稣猪精妖巢妖书妖器焚烧，家家石鏊十字架妖像当门践踏（王毅注：这立刻使人联想起“文革”中流行的“打翻在地，再踏上亿万只脚”的诅咒），堂设天地君亲师神位供奉。三日后违令者立刻合门屠之。（91）

崇文门外地沟内，拿着一人，身中搜出洋信三封，当即杀了。京中遍地竟汉奸，与洋人通声气，逐日遣出二毛子无数，……京中所住义和团，街巷皆有，终日搜拿二毛子，九城有数万人，尚有走（脱）者。（92）

“中国猪教极多”、“二毛子无数”、“有数万（二毛子）”！义和团这种神圣而无比可怕的判断，不是与原始宗教认定的“无所不在的邪魔”、以及后来“文革”认定的“牛鬼蛇神处处都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在我们身边”一脉相通吗？在这样的信仰基础上，上文列举的义和团狂热地四处搜捕二毛子、并仅仅根据一张纸、几枝铅笔等等微不足道的“证据”即毫不犹豫地致人以酷刑和死命，就不仅是必然的，而且尤其是具有极大神圣性的行为。这就象后来的红卫兵越是残酷地“横扫牛鬼蛇神”，就越表现出其崇高的“革命性”一样。

越是具有强烈神性的社会文化，越是要求人们一刻不停地搜觅牛鬼蛇神和各种异端、异教，并以最残酷、最彻底和最狂热的方式横扫这些“害人虫”。原始宗教的这一基本法则在义和团运动中更典型的表现，在于义和团捕风捉影地“深挖细找”所谓大行妖法的白莲教、以及对许许多多受到怀疑的无辜者扣上妖孽罪名、并施之以无情的杀戮。

白莲教是明清时期主要的民间宗教，其分布广泛，支派甚多，后来渐渐成了统治者称呼异端异教的代名词。作为一种起于民间的宗教组织，义和团原本就是白莲教及其分支的衣钵所传。（93）但是，当义和团成为社会的主流运动、特别是得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信奉之后，（94）义和团的宗教神圣性和政治权威性，也就必然要建立在永远充满敌意地对几乎一切其他社会成员的监视和惩罚之上；建立在视一切“本是同根生”的其他民间宗教为万恶的牛鬼蛇神、并对之施以残酷的围剿和屠戮之上。而这种必然性的原因，仍然是原始文化中“无所不在的邪魔”的原则、以及原始宗教神魔对立的“二元模式”。其具体事例在义和团运动中不胜枚举：

或在路遇，或自家中，将良民指为“二毛子”揪扭至坛上（王毅注：这立刻让人联想起“文革”时也是可以随意“揪斗”几乎任何人），强令烧香焚表，如纸灰飞扬或可幸免。倘连焚三次，纸灰不起，即诬为教民，不容哀诉。登时枪刀并下，

众刃交加，杀毙后弃尸于野，因是负屈误死者不可胜计。……况纸灰起与不起，毫无定凭，以人命作儿戏，其残忍可知。

（义和团）为拿白莲教之说以自固。……六月十八日，（菜）市处决男妇六十余人，劓一人；廿五日，又决三十余人；均不由刑部讯供。其以叛逆诛者，并无军械及谋反实据，其指为西宫者，乃一垂髫幼女；或询之，则并不知白莲教为何物。……（义和）团言白莲教有万余人在京，将尽数搜捕。……团之言曰：二毛与洋人交通，又曰白莲教遍于都城。……（菜）市口杀白莲教，人多，劓役不能办，（义和）团则帮同宰杀，有如鸡犬。

以良民而蒙白莲教之名，捉之者乃为白莲教同源之拳匪。……拳众攻使馆不下，无所泄愤，乃纵戮乡民。呼噪出永定门，遇赴集者悉縶之，连车载交刑部，凡百二十余人。指优伶衣冠、儿童玩具谓为白莲教之证。有妇人抱子宁家，亦陷其中。数尚阙，则縶车夫实之。未讯供，尽戮于市。

拳匪攻交民巷、西什库久，卒不能下，且伤毙甚伙，遂不敢前。耻无所事，又恶人之指为白莲教也，乃日掠城外村民男女老幼百余人，送步军署，逼请枭首，曰此为白莲教，而媒孽其证据，有纸人纸马（王毅注：即所谓大行妖法之物）鞘刀之属。纸人纸马者，村市所鬻小儿玩具，鞘刀则工艺所需，妇孺皆知其诬捏也。……妇人方乳之，夺之其口，即日决六十一人，宛转呼号，累累属于道，惨不忍睹，且皆愕然不知其何以至此也。又数日，复决三十余人，事如前。

不难看出，义和团如此捕风捉影地搜觅和极其残酷地屠戮一切可能的异端、异教者，乃是维系其教派以及文化体系神圣性所必须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义和团不仅把搜觅和剿灭所谓“遍于都城”的白莲教等异端异教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而且其自身内部亦进行着极其残酷的派系斗争：

义和团派别分歧，大师兄互相猜忌，发生多次内讧。乾字大师兄张承芝带领团民数十人，于七月十八日去山东边境拿二毛子，归途经郝家口，被潘荣祚带领坎字团包围，发生战斗。雒恩俊用箭射中张承芝，并将首级砍下来，挂在保林寺。（95）

尽管义和团的最初组织者希望并明文规定“各团师兄，不论何字，均系一家，尤当和睦”，（96）但是，既然义和团运动完全是建立在充满原始神性的文化基础上，那么为了维系这种神性的极端纯粹、特别是为了维系自己对这种神性的独占（即如本文第三节介绍的，每一原始氏族都必然强调：只有自己才是崇高神意的唯一体现者），义和团内部的派系分裂和相互屠杀也就是绝对不可避免的；这就象后来的不论“文革”领导者主观上是否希望“团结大多数”、“实现革命的大联合”，（97）以及如何焦灼地一遍又一遍强调：“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但是在社会文化体系中实际运行的，却只能是为了“誓死捍卫”而越来越疯狂的武斗、派仗和“全面内战”。

总之，由于义和团运动和“文革”在国民群体的信仰方式和行为方式等重大的方面继承了共同的蒙昧文化基因，所以义和团式的外在群众运动形式和相应的内在运行逻辑也就必然在“文革”中再次猛烈爆发出来。所以，当中国在义和团运动整整100年之后再次面临新世纪的开始、尤其是面临世界民主化和经济一体化潮流的时候，以往这两大悲剧之间的传承关系实在到了应该认真清理和认识的时候了。

□ 本文根据正待出版的《“文化大革命”与原始文化》一书第十章的内容改写而

成。作者王毅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通讯处：北京建内大街5号《文学遗产》编辑部，邮编：100732，E-mail:wangyi@public.fhnet.cn.net

注 释：

〔1〕高岩：《周恩来与外国专家》，1993年6月1日《光明日报》。

〔2〕1967年7月，北京第一机床厂、北京外国语学院、清华大学等十几个单位的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反帝反修联络站”。8月20日，中国外交部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最强烈抗议港英疯狂迫害香港爱国新闻事业”的照会。照会发出后，“反帝反修联络站”核心小组成员决定该日晚在英代办处门前召开“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商定：英政府若不接受中国外交部的照会，即由“联络站”核心小组成员率众冲进英国代办处的办公楼和住宅区，把英代办揪出来声讨，同时查抄反华材料、切断通讯线路、降下英国国旗。当晚，在“声讨会”进行过程中，许多与会者冲进代办处打、砸、抢，并放火烧了汽车和办公楼。第二天，《人民日报》以《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对英代办处采取强烈行动》为题报导了这次事件，文中说：“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昨晚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以来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详见北京日报社《宣传手册》编辑部编：《宣传手册》1985年第2期“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专集”第92页）

〔3〕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讲话》（1967年5月1日）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从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算做第一阶段，这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算做第二阶段，这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月风暴夺权大联合三结合，这可算做第三阶段。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以后，这可算做第四阶段。……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第四阶段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关键阶段，所以安排大批判的时间应比较长，中央文革还在讨论，有人认为今年年底为宜，有人认为明年五月份为宜，但时间还得服从阶级斗争的规律。”（《毛泽东思想万岁》176—179页；“文革”中出版，书中未标明出版者和出版地）

〔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红旗》1967年第5期14—16页。

〔5〕见李侃：《义和团运动评价问题》，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编：《义和团论文选》35页，中华书局（北京）1984年版。作者：柯夫，见1967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北京城中的东交民巷因为是西方国家使馆的聚集区，所以在义和团运动时，清政府和义和团用诅咒术将其改名为“切羊（洋）街”，运动失败后改回原名；1966年，红卫兵又将此街改名为“反帝路”，“文革”后再度改回原名。

〔6〕陈夔龙：《梦蕉亭杂记》，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义和团史料》68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2年版。近代以来直至义和团运动以前，主张改革维新的中国思想家（如冯桂芬、薛福成、郭嵩焘、王韬、唐才常、梁启超等），早已经普遍指出：一定要以世界“公理”、“公法”超越中国传统的“华夷之防”而作为处理中外关系和国内改良的准则。而这一思想直到“文革”之后，才开始普遍为中国人所接受，其间时光已经过去了一百年。

〔7〕详见《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见张口、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58—62页，三联书店（北京）1960年版。

〔8〕甘鹏云：《潜庐随笔》，《义和团史料》844页。

〔9〕胡适1914年5月15日日记，《胡适留学日记》第一册232页；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胡适1914年7月26日日记，《胡适留学日记》第二册315页。

〔10〕蔡元培：《华工学校讲义》，《蔡元培全集》第二卷436页，中华书局

(北京) 1984年版。

(11) 《李大钊文集》(上) 566页, 人民出版社(北京) 1984年版。

(12) 《半农杂文》第一册 109页, 北平星云堂书店 1934年版。

(13) 详见鲁迅:《热风·三十三》、《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一册 379—380页、27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 1959年版。直到晚年,鲁迅仍然经常发表对义和团抗拒现代文明的批评,例如《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而八国联军遂入京……”(《鲁迅全集》第六卷 451页);又如《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近代以来,“不知道为了觉得与其拜着孔夫子而死,倒不如保存自己们之为得计呢,还是为了什么,总而言之,这回是拼命尊孔的政府和官僚先就动摇起来,用官帑大翻起洋鬼子的书籍来了。……然而一定有反动。清末之所谓儒者的结晶,也是代表的大学士徐桐氏出现了。他不但连算学也斥为洋鬼子的学问;他虽然承认世界上有法兰西和英吉利这些国度,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是决不相信的,他主张这是法国和英国常常来讨利益,连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所以随便胡诌出来的国名。他又是一九〇〇年的有名的义和团的幕后的发动者,也是指挥者。但是义和团完全失败,徐桐氏也自杀了。政府就又以外国政治法律和学问颇有可取之处了。我的渴望到日本去留学,也就在那时候。”(《鲁迅全集》第六卷 250页)

(14) 《独秀文存》236页,安徽人民出版社(合肥) 1987年版。

(15) 《独秀文存》237—238页。

(16) 《独秀文存》240—241页。梁启超等“五·四”营垒之外、而同样对义和团运动持严厉批评态度、并对之进行深入文化分析的学者和政治家亦是如此,例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六章中说:“义和团事件之起,根于两种心理。其一,则排外心理。此种心理,出于国民之自大性及自卫性,原属人类所同然,惟中国则已成为畸形发达,……形成国民性之一部。其二,则迷信的心理,因科学思想缺乏之故,故口口迷信,支配民心之力甚大。”(《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十六册,123页,上海中华书局 1936年版)

(17)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 574—575页,三联书店(北京) 1984年版。

(18) 陈独秀:《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 613—615页。

(19) 见《李大钊文集》(下) 802页。

(20) 周作人:《读〈精华碧血录〉》,见周作人着:《雨天的书》179—180页,岳麓书社(长沙) 1987年版;这一时期内,周作人在许多文章中都谈到应该在弘扬民族精神的同时,消除民族文化中自大和蒙昧的“拳匪的排外思想”,详见其《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雨天的书》105页);《从犹太人到天主教》、《关于非宗教》(《谈虎集》379—380页、390页,北新书局 1928年版)等等。这段材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胡明先生抄录给我的,谨此表示感谢。

(21) 胡适:《致陈独秀(稿)》,见《胡适来往书信选》355—357页,中华书局(北京) 1979年版。

(22) 《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1942年2月),《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册 648—649页。

(23) 例如他在《抗日战争之意义》(1937年)中说:戊戌维新“又被清廷守旧的太后派所摧残而失败。这第二次改革的失败,遂酿成了庚子拳匪事变,八国联军占领首都的后果。”(《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册 538页)

(24) 范文澜着:《中国近代史》上册 329页,人民出版社(北京) 1962年版。

(25) 毛泽东:《读〈三国志集解〉批语》,《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15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3年版。

(26) 翦伯赞:《义和团运动》(1958年2月24日),见《翦伯赞历史论

文选集》328—333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80年版。

〔27〕（英）威廉·葛德文著、何慕李译：《政治正义论》412、413页，商务印书馆（北京）1980年版。

〔28〕比如康熙五十六年（1717），广东碣石镇总兵陈昂奏称：“臣遍观海外诸国，皆风正朔，惟红毛一口，奸宄莫测，中有英圭黎（王毅注：即英吉利）诸国，口族虽分，声气则一，请飭督抚关部诸臣设法防范。”（《清朝文献通考》卷二百九十八《四夷考》六）

〔29〕《湖南合省公檄》，见王明伦编：《反洋教书文揭帖选》1页，齐鲁书社（济南）1984年版。

〔30〕（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著、杨东莼译：《古代社会》67页，商务印书馆（北京）1977年版。

〔31〕《古代社会》232页。

〔32〕《古代社会》242页。

〔33〕《古代社会》83页。

〔34〕《左传·成公四年》引史佚之《志》，十三经注疏本1901页。

〔35〕《国语·晋语》，35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36〕（美）杰罗尔德·拉姆齐编、史昆、李务生译：《印第安神话传说》9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北京）1983年版。

〔37〕《印第安神话传说》11—13页。

〔38〕（美）罗伯特·路威著、吕叔湘译：《文明与野蛮》216页，三联书店（北京）1984年版。

〔39〕详见拙著：《园林与中国文化》9—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例如《尚书·多方》中说：“惟尔多方，罔堪顾之；惟我周王，承灵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传》释曰：“惟汝众方之中，无堪顾天之道”；“言周文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任天子。”（十三经注疏本229页；“任天子”原作“任天王”，依阮元《校注》改）例如《诗·大雅·文王》对周文王的神化：“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十三经注疏本502页）

〔40〕林惠祥著：《文化人类学》213页，商务印书馆（北京）1991年版。

〔41〕（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著、杨东莼译：《古代社会》79页。

〔42〕（德）恩斯特·卡西尔著、黄龙保、周振选译：《神话思维》11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2年版。

〔43〕（法）莫里斯·韦尔热著、杨祖功等译：《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55页，华夏出版社（北京）1987年版。

〔44〕《左传·哀公六年》：“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十三经注疏本2162页）《礼记·表记》：“诸侯非其国，不以筮。”（十三经注疏本1644页）。《礼记·祭法》，十三经注疏本1588页。《礼记·曲礼》：“大夫去国，祭器不逾竟”（十三经注疏本1258页）

〔45〕详见（法）列维·布留尔著、丁由译：《原始思维》230页，商务印书馆（北京）1986年版；（德）利普斯著、汪宁生译：《事物的起源》251页，四川民族出版社（成都）1982年版；张紫晨著：《中国巫术》78页，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0年版；宋兆麟著：《巫与巫术》126页，四川民族出版社（成都）1989年版；覃光广等编：《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概览》221、230、281、342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北京），1988年版；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侗族简史简志合编》62页，中国科学院内部刊本（北京），1963年版。

〔46〕（法）列维·斯特劳斯著、李幼蒸译：《野性的思维》134页，商务印书馆（北京）1987年版。杜尔凯姆：《宗教生活的原始形式：澳大利亚人的图腾体系》，转引自（苏）海通著、何星亮译：《图腾崇拜》20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原始思维》。

〔47〕见杨知勇：《从东巴教的祭天看原始宗教仪式的内涵与功能》，中国社会

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办：《世界宗教研究》1990年第4期55页。

〔48〕吕大吉主编：《宗教学通论》38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9年版。

〔49〕（法）列维-布留尔著、丁由译：《原始思维》382页。

〔50〕（英）罗素著、徐奕春、林国夫译：《宗教与科学》48页、42页，商务印书馆（北京）1982年版。

〔51〕富育光著：《萨满教与神话》67页，辽宁大学出版社（沈阳）1990年版。

〔52〕详见覃光广等编着：《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概览》98页、187页、237页、292页。

〔53〕《楚辞·招魂》：“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长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来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西方之害：……赤蚁若象，玄蜂若壶些。……北方不可以止些，……虎豹九关，啄害人些。……豺狼从目，往来□□些，悬人以□，投之深渊些。……天地四方，多贼奸些！”（《楚辞集注》卷七，135—1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54〕《诗·大雅·荡》，十三经注疏本553页。

〔55〕（晋）干宝：《搜神记》卷十二，146页，中华书局（北京）1979年版。

〔56〕《吕氏春秋·恃君》：“雁门之北，……饕餮、穷奇之地，……此四方之无君者也。其民麋鹿禽兽，……日夜相残，无时休息，以尽其类。”（《吕氏春秋校释》1322页，学林出版社，上海，1984年版）

〔57〕（汉）王充：《论衡·订鬼》，3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58〕《史记》卷一《五帝本纪》，36页，中华书局（北京）校点本。《魏书》卷一《序纪》：“……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1页，中华书局校点本）（汉）张衡《东京赋》：“尔乃卒岁大雉，殴除群厉，……逐赤疫于四裔。”（《文选》卷三，63页，中华书局，北京，1977年影印本）

〔59〕《隋书》卷二《高祖纪下》，43页，中华书局校点本。

〔60〕黄世杰：《桂西壮族鬼的观念浅析》，《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62页。

〔61〕王国维曰：“我国古时，有一强梁之外族，……是以中国之称之为也，随世异名，因地殊号，至于后世，或且以丑名加之。其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其在宗周之季，则曰□狁。”（《鬼方昆夷·狁考》，《观堂集林》卷十三，583页，中华书局，北京，1959年版）《左传·闵公元年》，十三经注疏本1786页。

〔62〕《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2466页，中华书局校点本。

〔63〕朱元璋：《谕曹国公文忠西平侯沐英等》，《明太祖集》卷八，174页，黄山书社（合肥）1991年版。

〔64〕《魏书》卷五十三《李□传》，1177—1178页，中华书局校点本。

〔65〕《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3034页。

〔66〕《旧唐书》卷七十九《傅奕传》，2715—2716页，中华书局校点本。例如《周礼·春官·大祝》：“大师，宜于社，造于祖。设军社，类上帝。国将有事于四望、及军归，献于社，则前祝。”（十三经注疏本811页）例如北魏与夏（赫连氏）交战时，魏帝“亲祈天、告祖宗之灵而誓众”（《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72页）；北齐、北周交战时，齐国出兵前“大集晋祠”（《北齐书》卷八《后主纪》，109页，中华书局校点本）；辽代礼制也是：“将出师，必先告庙。乃立三神主祭之，……将临敌，结马尾，祈拜天地而后入。下城克敌，祭天地。”（《辽史》卷五十一《礼志三》，845页，中华书局校点本）

〔67〕饶州第一伤心人：《天主邪教集说》（1862年），《反洋教书文揭帖选》8页。第一伤心人：《辟邪歌》，《反洋教书文揭帖选》11-13页。彭春台：《檄文》，《反洋教书文揭帖选》90—91页。《江西省刊布揭帖》，《反洋教书文揭帖选》21页。《鬼叫该死》，《反洋教书文揭帖选》194—196页。饶州第一伤心人：《天主邪教集说》（1862年），《反洋教书文揭帖选》9页。

〔68〕仲芳氏：《庚子纪事》，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庚子记事》28页，中华书局（北京）1978年版。

〔69〕陈垣庆：《清季野闻》，《义和团史料》637页。刘以桐：《民教相仇都门见闻录》，见翦伯赞等编：《义和团》（二）193页，参见同书191页、19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王火选辑：《义和团杂记》，《义和团史料》8页。《义和团乱语》，《义和团史料》18页。《英国档案馆所藏义和团资料·北京西城张贴的揭帖》，《义和团史料》541—542页。例如黄曾源《义和团事实》所说：“义和团将起，先创为‘教民勾通俄罗斯，将于八月十三日起事’之说，以相煽惑。……盖团民以奉天主教者为横逆，天主教法兰西主之，……俄罗斯向不传教，教案与俄无涉。而中国人于外国人概以洋人目之，不知地球之大，各君其国，……是俄罗斯之与教民固风马牛不相及。”（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125页，中华书局，北京，1964年版）

〔70〕详见拙文：《毛泽东的“打鬼战略”》，《炎黄春秋》1999年第5期。

〔71〕见1964年11月29日《人民日报》。在“文革”后期，毛泽东对西方国家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这对中国命运的积极意义是十分重大的。这一转变的起因及其与毛泽东“文革”战略所遭受挫折（特别是“9·13事件”）的关系，是尚待研究的问题。

〔72〕张戎著、张朴译：《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186—187页，中华书局（台湾）1992年版。

〔73〕康有为：《性学篇》，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12页，中华书局（北京）1982年版。

〔74〕《鬼叫该死》，《反洋教书文揭帖选》199页。

〔75〕仲芳氏：《庚子纪事》，《庚子记事》12—13页。杨典浩：《庚子大事记》，《庚子记事》86页。龙顾山人：《庚子诗鉴》，《义和团史料》33、38、73、131页。柴萼：《庚辛纪事》，见翦伯赞等编：《义和团》（一）305页。罗敦：《庚子国变记》，见阿英编：《庚子事变文学集》946页，中华书局（北京）1959年版。《宁津县志稿》（1964年编，原题《宁津义和团反帝运动》），《义和团史料》973页。《唐文治自订年谱》，《义和团史料》745页；又，义和团揭帖亦“声称二十九日将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王毅注：即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佐原笃介：《拳乱纪闻》，见翦伯赞等编：《义和团》第一册114页）这些“横扫”立即让人联想起“文革”时“砸烂十七年教育制度”的理由也正是：魔鬼一样的资产阶级统治了我们的学校。黄曾源：《义和团事实》，《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129页。龙顾山人：《庚子诗鉴》，《义和团史料》52页。佚名：《综论义和团》，《义和团史料》183页。左绍佐：《悟彻源头·上徐桐书》，《义和团史料》234—235页。

〔76〕详见高皋、严家其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498—499页、517—52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西方人的一件极平常细小的礼物（玻璃蜗牛）导致了“文革”中的一场巨大的风暴，这当然有江青等人出于政治目的而兴风作浪的原因。但是，这类理性社会中的微末之事，之所以在“文革”中必然被急遽夸大并通过政治操作而笼盖全国，其根源还在于“一切魔鬼”随时都在通过诡计蛊害我们神圣的制度这一文化前提绝对不容置疑的“巫魅”性。

〔77〕梁启超：《排外平议》，见郑振铎编：《晚清文选》469—470页，

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生活书店1937年版。

〔78〕胡思敬：《驴背集》，见翦伯赞等编：《义和团》（二）507页。罗敦：《庚子国变记》，见阿英编：《庚子事变文学集》960页。吴永：《庚子西狩丛谈》，见翦伯赞编：《义和团》（三）387—391页。《宁津县志稿》（1964年编，原题《宁津义和团反帝运动》），《义和团史料》972页。仲芳氏：《庚子纪事》，《庚子记事》26页。佚名：《庸扰录》，《庚子记事》252页。罗敦：《庚子国变记》，见阿英编：《庚子事变文学集》946-949页。景善：《庚子日记》，见阿英编：《庚子事变文学集》1031页。李超琼：《庚子传信录》，《义和团史料》212页。

〔79〕详见拙文：《“万物生长靠太阳”与原始崇拜》，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127—138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80〕黄曾源《义和团事实》，《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126页。

〔81〕柴萼：《庚辛纪事》，见翦伯赞等编：《义和团》（一）308页。《宁津县志稿》（1964年编，原题《宁津义和团反帝运动》），《义和团史料》973—974页。关于“剃鬼头”等人身侮辱方法隐含的巫术传统和原理，详见拙文：《“文革”中爆发流行的人身侮辱方法及其巫术原理》，将刊于《东方文化》（广州）1998年某期；关于“大批判”秉承的巫术原理及传统，详见拙文：《“大批判”与诅咒巫术》，《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春季号。

〔82〕仲芳氏：《庚子纪事》，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庚子记事》15—27页。《石涛山人见闻录》，见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82页。佚名：《庸扰录》，《庚子记事》250—258页。义和团成员除了有大量儿童以外，甚至尚有“在口抱者”（见黄曾源：《义和团事实》，《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134页），这也与“文革”中的亿万青少年争当红卫兵、红小兵的局面极为相似。龙顾山人：《庚子诗鉴》，《义和团史料》73页。《文安县志》，《义和团史料》947页。仲芳氏：《庚子纪事》，《庚子记事》12页。仲芳氏：《庚子纪事》，《庚子记事》22—23页。王火选辑：《义和团杂记》，《义和团史料》6页；有的揭帖中说：“见者不传，吐血而亡。”见同书984页。

〔83〕转引自杨健着：《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18页，朝华出版社（北京）1993年版。

〔84〕《义和团揭帖》，《义和团史料》12页。

〔85〕《义和团乱语》，《义和团史料》19页。

〔86〕恒谦：《手札残稿》，见阿英编：《庚子事变文学集》1144页。

〔87〕覃光广等编着：《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概览》54页。

〔88〕赵声伯：《庚子纪事长札》，《义和团史料》656页。黄曾源《义和团事实》，《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137页。佚名：《庸扰录》，《庚子记事》261页。《犍为县志》，《义和团史料》1065页。与义和团的“遣神将出洋，往西洋扫灭各国”极为相似，我们在红卫兵的文献中，也经常可以看到“杀！向莫斯科、华盛顿进军！杀他个人仰马翻而已，打他个天翻地覆慨而慷”（见杨健着：《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49页）之类豪迈的理想。佐原笃介：《拳事杂记》，见翦伯赞等编：《义和团》（一）289页。佚名：《综论义和团》，《义和团史料》188页。龙顾山人：《庚子诗鉴》，《义和团史料》74页。

〔89〕狄平子：《庚子纪事》，见阿英编：《庚子事变文学集》1001页；而与此相映对的是：八国联军破城之前，“市中店铺招牌，亦互题新名曰‘义和昌’、曰‘义和兴’、曰‘义和泰’，皆以媚（拳）匪也。”（柴萼：《庚辛纪事》，见翦伯赞等编：《义和团》（一）307页）

〔90〕详见拙文：《20世纪造神狂潮的迷妄与幻灭——从卡西尔等人对法西斯主义的剖析谈起》，《东方》（北京）1995年第5期；《王小波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方式及其意义》，王毅主编：《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271—273页，光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8年版。。

〔91〕周汉：《大清臣子、周孔徒遗嘱》，见王明伦选编：《反洋教书文揭帖选

》227页。

〔92〕恒谦：《手札残稿》，见阿英编：《庚子事变文学集》1144页。

〔93〕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按义和拳一门，乃白莲教之支流，其教以练习拳棒为由，托言神灵附体，讲道教拳，诡称念诵咒语，能御枪炮，有祖师及大师兄、二师兄等名目。”（见翦伯赞等编：《义和团》（四）438页）又，杨典诰：《庚子大事记》：“查义和教以八卦为名，……故又名八卦教”（《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1页）；“八卦教”为白莲教分支，详见濮文起着：《中国民间秘密宗教》9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1991年版。

〔94〕景善《日记》：“闻以老佛每日于万几之暇，必将神团咒语诵七十次。诵毕，由李总管言以又亡洋夷一名等语”，见翦伯赞等编：《义和团》（一）73页。又如：“王培佑召见时，揣摩太后意旨，乃云：‘臣举家皆义和团中人。’不三日而超擢顺天府府丞。”（佚名：《综论义和团》，《义和团史料》202页）

〔95〕仲芳氏：《庚子纪事》，《庚子记事》25页。黄曾源《义和团事实》，《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126—133页。龙顾山人：《庚子诗鉴》，《义和团史料》50页。李超琼：《庚子传信录》，《义和团史料》215页。《宁津县志稿》（1964年编，原题《宁津义和团反帝运动》），《义和团史料》975页。

〔96〕《团规》，《义和团史料》3页。

〔97〕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1967年7月—9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385—38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8年版。

~~~~~  
【史海钩沉】<

一起荒唐的“蜗牛事件”，中国人晚看五年彩电

• 李中强 •

谈起当年震惊世人的“蜗牛事件”，孙顺兴先生手捧着那个晶莹的玻璃蜗牛，脸上现出复杂的神情——滑稽？无奈？气愤？遗憾？或是因时间的冲刷而形成的淡漠？似乎都有，又似乎……

◇ 引进彩管生产线为了甚么

孙先生说，1972年，国务院批准从国外引进一条彩色电视机生产线，决定由当时的四机部、外贸部、广播局和国家计委负责实施。引进的直接原因现在想起来也很可笑，并不仅是为了使中国的彩电行业尽快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更重要的是为了“更逼真地反映领导同志的光辉形象。”黑白电视上看领导不够光彩嘛！于是，我们组成了十二个人的考察团，当时我在四机部对外司具体负责这个事情。1972年底我们先赴日本考察，五十多天，连春节都没有回来，把日本的电视机厂家松下，日立，索尼，东芝，三菱和夏普看了个遍。一考察才恍然大悟，现在还谈不上电视机生产线，还差的远着呢！要彩电先得要显像管，仅生产显像管就需要玻壳、荧光粉、荫罩、石墨乳和总装等好几条生产线。当时在日本要四家才能把这个显像管弄齐，怎么办呢？

回国后，我们了解到美国有一家叫RCA的厂家这四种技术都有，于是又写报告，由外贸部向RCA寻价。对方报价很快，接报价后即组织翻译并邀美商来京并开始谈判。当时RCA报价一亿三千万美金，谈判结果降到七千三百万。1973年11月23号我们这十二人又组团到美国实地考察，参观完RCA，考虑到各国的玻壳技术都来自于康宁公司，于是又到康宁公司进行考察对比，之后我们就准备返国了。

#### ◇ “蜗牛事件”悄然降临

在机场，我们登上了回国的飞机。这时一位康宁公司的雇员扛着一个箱子跑了上来，从箱中取出一个个包装得很好看的硬盒子。打开一看，原来是送给我们的礼品——每人一个玻璃蜗牛。当时谁也没有多想什么，很高兴很礼貌地接受下来。回国后向部领导汇报工作，大家还传看了一下，都觉着康宁的玻壳确实不错，透明度高，没有气泡。同时，从康宁公司出版的工艺礼品册子中，发现这只小蜗牛价值 55 美元。

此时，正赶上一月底二月初，快过春节了。代表团向部领导汇报后，决定不放假，家在外地也别回去了，抓紧总结，研究到底从哪个公司引进哪项技术。但谁也没有想到……

1974 年 2 月 10 号，春节放假的最后一天，下午 3 点，突然有三辆“大红旗”驶进了四机部机关大院，钻出来的竟是江青！她下车就点名要见我们部设计院政治处宣传科的一个干事。为什么要见他呢？原来我们回国后他给江青写了一封信，说代表团在美考察时，康宁公司为了讽刺挖苦中国的“爬行主义”，送给代表团每人一个蜗牛。

江青下车便大放厥词，说这是美帝国主义向我们挑衅，竟敢污蔑我们是爬行主义。骂了一通后江青又发指示，要外交部向美国驻华联络处发照会提抗议，把蜗牛送回去，对帝国主义的挑衅我们要坚决回击！当时王净部长不在，副部长高峻接待的江青，整的这老头不知说什么好，只得哼哼哈哈，点头哈腰的。

那时全国正在批判意大利的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说他丑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件事一出来，正好火上浇油！

江青一走，部里就派人到家里找我说：老孙啊，你快来吧，出事了！

#### ◇ 李先念发脾气了：你×××

11 号，中央就开会了，副总理李先念召集四个部门的领导开会，李先念在会上发脾气了：“你娘个×！人家给你个反动标语，你也不打开看看？”

同时，四机部也发了简报，通报全国。江青有指示啊，全国都要查，这几年各部委、各省市、举国上下各个单位都收到什么礼品了？有没有类似蜗牛一样污蔑中国的东西？象有的单位就查出了黄牛和乌龟，乌龟是日本人送的，日本人认为是长寿，中国可不这样认为；黄牛也是一样，老牛拉破车呀！

12 号，周恩来总理又召集这些领导开会，责成外交部查一查接受礼品有什么规定，美国送蜗牛有什么讲究。中联部也找外国在华专家调查一下。

外交部立即给中国驻美联络处发电，要求调查美国人送蜗牛的用意。14 号，调查反馈回来了：美国人没有任何讽刺挖苦中国的意思，目的只是想讨好中国人，希望中国买他们的技术，蜗牛只是圣诞节的一种传统礼品，没有快呀慢呀的概念，还有外国专家称，蜗牛代表吉祥，美国还有歌颂蜗牛的诗歌。

因为当时四人帮很猖獗，连周总理都惹不起他们，所以电报一回来并没有完全向下传达，只是决定事情不再扩散了，对代表团成员不做任何处理。

但是，引进彩管生产线的工作却停止下来，谁还再敢搞“爬行主义”啊！怎么

怎么办呢？四机部就让那个宣传科的干事带着设计院 18 个人到南京市 741 厂即华东电子管厂去搞“争气管”，可一直也没有搞出来，1982 年该厂不得不从意大利买了一条旧的生产线，这是后话。

当时部里在总后勤部开批判安东尼奥尼大会，有人也向大会写条子，让我们“蜗牛成员”上台表态，幸好我得到当时的司长邓国军的保护——他和我谈，你别上去，看他们怎么办。我的夫人也在部属单位工作，当时也被人戏称做“蜗牛夫人”。在部里有人还贴出了大字报，骂我们卖国。现在想起来，如果没有周总理出面，由江青他们胡折腾，还不知弄成什么样子，我的处境也更难说了。

◇ 老百姓晚看了五年彩电

1976 年，四人帮倒台了，上面说的这四个部门才重新打报告，国务院批准后重新去日本考察、谈判。一百多人在北京，天津谈了一年多，到 1979 年 9 月才最后与日方签订合同，总装是日立的，玻壳是旭硝子的，荧光粉是大日本涂料的，荫罩是大日本网版的。四条生产线约花了一亿六千多万美金。

讲到这里，孙先生叹了一口气：“蜗牛事件”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多花了近九千万美元，也就是白白把七亿元人民币送了人；另一点是引进生产线整整晚了五年时间，换句话说，中国的老百姓本可以早五年看上彩电的；此外，还使中国的彩电制式从此走上了日本的 P 制的道路而没有走美国的 N 制道路。

说到对个人的影响，孙先生认为最重要的是转变了一个认识：以前总把一些高级领导当作神，后来才觉得，原来他们也是人，有时也会胡说八道，也会害人。至于个人仕途，孙先生倒是看得很淡，而且觉得国家和单位领导一直待自己不薄。谈话中，孙先生充满感激地数着使他幸免于难的好领导或领导的领导：把事情压下来的周恩来，小红军出身的司长邓国军，井冈山时期国民党张辉瓒的副排长后来抱着电台投了红军的老部长王诤和他的后任刘寅、张挺，1984 年上任的部长江泽民等。

打倒四人帮后，孙先生珍藏起了那个“劳什子”——玻璃蜗牛，为了纪念这段“荒唐”的历史，也为了将来给孙子讲“蜗牛爷爷”和“蜗牛奶奶”的故事。

∞ ∞ ∞ ∞ ∞ ∞ ∞ ∞ ∞ ∞ ∞

“红卫兵绑架李井泉”始末

• 何 蜀 •

“文化大革命”前期，在上海发生过一起红卫兵跨省绑架高级领导干部的事件。

这里所说的绑架，自然不应从原有的字面意义上去理解。一般所称的绑架，是指绑架者以暴力或欺骗手段劫持、羁留和拘禁他人，并以被绑架者的生命安全为条件进行要挟，达到某种非法目的，如勒索钱财，赎换被捕的有罪同伙等等。在这方面，人们熟知的事例不少，如 40 年代上海滩的土匪绑架著名实业家荣德生，70—80 年代意大利极左派恐怖组织红色旅绑架总理莫罗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官员多齐尔准将等。

而本文所说的绑架则不同，绑架者不但没有使用棍棒、刀枪，连一根绳索也没有使用。绑架中既未使用暴力，也不是为了达到个人或少数人的非法目的，而是为了当时几亿人热烈拥护的最革命、最崇高的目的——遵照毛泽东的教导进行“文化大革命”。而被绑架者，也正是为了这同一目的，才会老老实实地跟着手无寸铁的



绑架者走而没有进行反抗或试图逃跑——这样的怪事，只有在那个史无前例（甚至很可能是史无前例）的“大革命”里才会发生。

这次跨省绑架行动的绑架对象，是当时中国西南地区的最高领导人李井泉。

李井泉这个名字，今天的年轻人多半会感到陌生。其实，他曾经是中国大陆上重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爆发时，他担任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重要职务。在“文化大革命”前，他忠实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不论是抓右派，反右倾，还是在“四清”运动中大整“烂掉了的基层政权”，大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都像领导军队打仗一样，领导西南特别是四川省干得轰轰烈烈，从不落后，毫不手软。因为他的军人作风，干部们都习惯于称呼他军队中的职务“李政委”。在那时，领导干部们一般都把他与前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等一起视为高级干部中紧跟毛泽东的左派。

李井泉本人大概也没想到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烈火”会烧到自己身上来，运动开始后，他积极领导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仿照北京的模式，揪出了以老干部马识途、李亚群、沙汀为首的所谓四川“三家村黑帮”和不少“牛鬼蛇神”。直到1966年10月1日，他还以领导者的身份，像毛泽东那样穿着军装，在成都人民南路广场检阅国庆游行队伍。

然而，“文化大革命”真正是史无前例，谁也不会料到竟发展到了“打倒一切”的地步。领导干部中，不光是历史上被抓住“辫子”的所谓“叛徒”，也不光是工作中表现比较右倾的所谓“黑帮黑线人物”，整来整去，几乎凡是带“长”字的都遭到了“炮轰”、“火烧”。李井泉自然也“在劫难逃”了。

#### ◇ 红卫兵内部冲突 “走资派”意外失踪

西南局设在成都，“文化大革命”以来，李井泉一直在重庆、成都等地来回奔走，积极“领导运动”。可是，为什么红卫兵要跨省跑到上海去抓李井泉呢？原来，在这之前，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走资派失踪”事件。

这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邓小平都被迫在会上承认“错误”，作了检查。李井泉出席了会议，明白了毛泽东的决心和中央精神，回到四川后，他就准备按照毛泽东的要求，采取主动，向群众作出对“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检查。于是，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便与当时成都最大的红卫兵造反组织红卫兵成都部队联系，商定共同召开一个批判大会，好让李井泉等领导干部在会上向群众作公开检查，以便过好这一关。当时已跃升为中共高层领导第四号人物，在中央协助周恩来主持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也十分重视这次大会，几次同李井泉通电话，询问他的身体状况能否胜任这样的大会检查，希望他能通过这次检查取得群众谅解，重新以“革命干部”的姿态站出来“领导运动”。

1966年11月13日，以红卫兵成都部队领衔的几个群众组织主持，在成都人民南路广场召开了25万人的批判西南局、四川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大会。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西南地区最高规格、最大规模的批判大会。为了保证大会正常进行，李井泉与红卫兵双方商定，后勤工作由西南局和四川省委、成都市委负责，会场秩序由红卫兵成都部队派出纠察维持。

当时造反派尚处于少数派地位，大多数党政机关也还在正常运转，因此许多单位是由党政机关通知组织群众到会，公安部门也布置了一些人员担任警戒工作。由

于干部们普遍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在通知开会时就难免有些跟不上形势的说法，如把“听李井泉作检查”说成“听李政委作报告”之类。

种种“动向”传到红卫兵耳中，就引起了一些人的猜疑。红卫兵内部闹起了矛盾。以红卫兵成都部队四川大学支队（即八二六战斗团）为首的一些红卫兵，认为红卫兵成都部队总部头头“右”了，“修”了，会前与李井泉达成的关于大会的协定是“拿原则做交易”，连“打倒李井泉，改组西南局”的口号都不敢提，这次大会成了李井泉的阴谋。于是，他们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等组织和一些外地赴蓉红卫兵商定，要造大会的反。

于是，在大会进行中，还没有等到李井泉走上前台宣读《检查》，这些造反派组织便联合发起了向大会造反的行动。他们打着各自的旗帜，举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高呼着“造反有理”的口号，散发造反声明，强行冲击主席台。这一来，会场秩序大乱。

混乱之中，为了保证李井泉的人身安全，一些红卫兵纠察人员将他护送离开了会场。事后不久，却又传出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说是那天护送李井泉的并不是红卫兵，而是由公安部门组织的便衣人员冒充红卫兵，趁会场大乱之机将李井泉转移走了！

李井泉自18岁参加革命以后，长年在军队中工作，南征北战，风餐露宿，早已落下一身的病，这时他已年近花甲，哪里经得起这种史无前例的折腾。被护送离开大会会场后，他就先后转移到尚未掀起造反浪潮的成都市郊几个单位招待所养病，随后又转移到灌县、彭县、西昌、渡口和云南省的元谋、昆明等地。在此期间，李井泉一直与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保持电话联系，关心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健康发展”——按造反派的说法，则是在“幕后操纵破坏文化大革命”。

12月底，根据西南局书记处的建议，李井泉通过秘书向中央办公厅电话请示想去北京，但没有得到回复——北京局势这时已经变得更加混乱，街头已经贴出了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标语和大字报。竭力想要控制局势的陶铸已经自身难保，新年刚过三天就被打倒了。

风声越来越紧，1967年1月4日，就是在陶铸突然宣布揪出来打倒的那天，李井泉去到了上海。

#### ◇ 造反派拿到中央电报 红卫兵拟定“战斗方案”

自李井泉被转移走后，造反派就失去了批判的活“靶子”。

重庆当时最有名的红卫兵造反组织——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刚好是在那次批判大会前派了个30余人的“赴蓉挺进纵队”到成都，主要目的就是想要将李井泉揪到重庆去批判。到成都后，他们住进了四川大学，正赶上了参加人民南路广场的批判大会。可是没想到这次批判大会闹得不欢而散，更没想到会后听说李井泉失踪了！

重庆大学这个“挺进纵队”抓不到李井泉，怎么好回去交差？遍寻不得之后，他们以红卫兵名义向这位西南地区最高领导人发出了《通缉令》。这样的《通缉令》虽然文字杀气腾腾，但是既无法律效力，也没有多少实际作用。单凭这些年轻人的满腔“革命热情”，是不可能抓到李井泉的。

转眼已过了1967年的新年，群众性的造反浪潮已经席卷全国，并开始由“

打倒一切”发展到“全面夺权”。这时，西南局办公厅于1月10日前后收到一份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来的电报，内容是要李井泉到群众中去，有错误就检查错误，不要怕群众。

当时西南局机关也已经有了造反派组织。电报被造反派拿到，便有了“尚方宝剑”。造反派正愁找不到李井泉，这一来有了办法。1月15日，他们去找到正由西南建委造反派“监管”、批判的西南局书记处书记程子华，向他询问，中央给李井泉的电报应该转到何处。那时尽管已经开始天下大乱，但是领导干部们的组织观念仍然是很强的。何况，谁敢承担“封锁中央声音”的罪责？于是，程子华便说了李井泉已到上海养病的情况。但他也不知道李井泉在上海的具体住处。

以往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份电报是造反派伪造的。其实这是不了解当时形势的臆测。这份电报是完全符合当时的中央精神的。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后，曾作过几条家喻户晓的“最高指示”，其中一条就是专门对领导干部们讲的：“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就在1月15日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广播了《红旗》杂志1967年第二期社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群众里面去》，这篇社论就是要领导干部们执行毛泽东的这条指示，并且指出：“肯不肯和敢不敢到群众里面去，这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一个根本分界线。”社论还严厉警告：如果领导干部不到群众里面去，“他们同群众感情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有的人甚至要一步一步发展到指责群众运动、压制群众运动，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样，他们同党同人民矛盾的性质就会起变化，从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

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的“挺进纵队”有一个驻西南局支队，正在到处打听李井泉的下落。西南局机关造反派看到成都红卫兵正为两派冲突闹得不可开交，也就把中央来电要李井泉出来见群众和李井泉在上海的消息告诉了重庆大学红卫兵。重庆大学红卫兵闻讯，如获至宝。迅即决定赴上海抓李井泉，并拟定了“战斗方案”。

他们首先研究了这个问题：上海这样大，怎样才能找到李井泉？他们知道，当时上海造反派已经控制了局势，但肯定不知道李井泉这样的大“走资派”藏在上海，否则定会将其赶走。因此，要找到李井泉，还得通过华东局的“走资派”设法“智取”。然后，再如此这般……

#### ◇ “北京来客”住进高级饭店 “战斗小组”亮明真实身份

1月17日下午5点半，重庆大学红卫兵三人，西南局机关造反派二人组成的“战斗小组”，押着向西南建委造反派“借”来的程子华及其秘书，带着中央电报，乘飞机飞赴上海。因为程子华当时还担任着国家建委和国家计委的副主任，到达上海后，“战斗小组”成员便冒充国家计委工作人员，给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打电话，谎称程子华从北京开会回来途经上海，有事要找华东局书记魏文伯、韩哲一商量。

这时上海同全国各地一样已经处于大动乱、大夺权的“一月风暴”之中，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和一些基层单位已经被造反派夺权。官方传媒播发了得到毛泽东高度赞扬的上海造反派的《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并且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给上海造反派发出了《贺电》。在这

《贺电》的鼓舞下，15日已发生了一起由上海红卫兵第三司令部联合上海工总司二兵团向市级党政机关夺权的行动，但因造反派内部矛盾，加上张春桥、姚文元因这次夺权行动未事先征求他们的意见而不满，拒予以承认，使这次夺权流产了。因此，这时华东局的机关日常工作仍在艰难运转，华东局办公厅行政处得知“国家计委”来人后，便派来人员将他们安排到了锦江饭店住下。

在锦江饭店，“战斗小组”先找来了华东建委一位副主任，从他口里打听到，华东局的几个当权派，曹荻秋已被打倒，正在监督劳动；魏文伯已经停止工作，在作检查；韩哲一还在造反派监督下管一些事务工作。他们分析，只有找韩哲一才可能打听到李井泉的下落。于是，他们便通知韩哲一前来。并向程子华规定了韩哲一来时的讲话口径。电话打出后，他们在房间里足足等了两个小时。

直到深夜，韩哲一才在两个工人造反队员押送下赶到饭店。

韩哲一到来后，事情却又没有像“战斗小组”预定的那样进行，而发生了意外。

重庆大学红卫兵和西南局机关造反派事后发表的同样题名为《智擒李井泉》的文章里，对此有不同说法。按西南局机关造反派的说法，是韩哲一刚进门，程子华就问：“李井泉在哪里？”而重庆大学红卫兵的文章却说，因为程子华在听说了华东局几个当权派的情况后，显得神情沮丧，“战斗小组”担心他不会再按他们规定的口径说话了，便当机立断，先发制人，等韩哲一一进门，一个红卫兵便厉声喝问：“李井泉在哪里？窝藏西南人民的罪犯该当何罪？”……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出入？估计是文章的写作者各有不同的动机。西南局机关造反派大概是为了说明程子华经过他们的教育，已经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而重庆大学红卫兵则多半是为了表现自己在“毛泽东思想”武装下如何发挥了大智大勇。

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关方面查证这一事件时，才弄清楚了真相。

原来，韩哲一进门后，程子华果然不按“战斗小组”规定好的口径，而是开门见山向他说明了真实情况：他不是开什么会路过这里，而是被红卫兵押着来抓李井泉的（笔者当年在重庆还看到过另一种说法的大字报，称红卫兵在“革命干部程子华”的“帮助”下抓到了李井泉。其实，所谓“帮助”的真相就是如此）。

重庆大学红卫兵一看假戏不能再演下去了，便马上掏出红卫兵袖章、胸章，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并让西南局机关造反派拿出那份中央电报给韩哲一过目，说是必须交给李井泉。要李井泉按照中央电报要求，回四川接受群众批判。

韩哲一自然也不敢“封锁中央声音”，“对抗文化大革命”，便如实说出了李井泉在上海的住处——中共上海市委瑞金街招待所。

“战斗小组”为了防止走漏消息，“以革命的名义”将韩哲一扣留在饭店里。他们得知李井泉带有秘书、医生、护士、保卫干部、警卫人员共7人，还有警卫武器，而这些红卫兵、造反派人又少，又手无寸铁，怎么办？这难不倒他们，因为他们有的是“战无不胜”的武器——“毛泽东思想”，即毛泽东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

上海市委招待所门前有警卫岗哨，当时还是不能随便进去的地方。怎么办？“战斗小组”便派出两人，立即去找上海市公安局造反派求援。这时已是凌晨4点，

满城的造反喧嚣已经停息，上海街头只有寒风在撕扯着满墙的标语、大字报，但自认为是在为真理而斗争的红卫兵、造反派却只感到“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上海公安局仍然有造反派在“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坚持“战斗”。刚好在1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公安部给各级公安部门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要求公安部门“坚决执行和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支持革命左派，支持左派的一切革命行动（包括夺权“接管”）”。上海公安局造反派听了四川造反“战友”的介绍，当即决定，派三人配合他们的行动。

#### ◇ 招待所闯进不速之客 红卫兵坐上特派专机

一切安排停当，已到了18日凌晨6时左右。“战斗小组”押着韩哲一的秘书，到了李井泉住宿的瑞金街招待所。有公安人员引路，他们顺利进了大门。进去时，李井泉的随行人员正在楼下餐厅里准备用早餐。“战斗小组”给这些工作人员“宣传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看到有人流露出抵触情绪，便质问：“你是保卫毛主席还是保卫李井泉？”这样的问题，自然只能作一种回答，当年确实压服过许多人。

随后，“战斗小组”留下几人继续对李井泉的随员作工作，其他人与上海公安局的三个造反派一起直奔二楼房间，顺利找到了李井泉。他们先对李井泉进行了搜查，然后拿出中央电报给他看，并向他宣布：要将他押回四川批判。

李井泉大概早已从传媒中了解到了与这份电报相同的中央精神，未对电报表示任何怀疑，只是提出应等医院体检表拿到后再走，这自然被红卫兵、造反派认为是“耍花招”而否决了。

早饭后，“战斗小组”负责人、重庆大学红卫兵向李井泉一行宣布：从现在起，一切听他们指挥。李井泉和秘书、警卫员及医生一人跟他们一起回四川，其他三名随员，在他们走后24小时内不得离开招待所，不得向外打电报、电话，其后自行回川，到成都向驻四川大学的“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赴蓉挺进纵队”报到。并且警告：若有违抗，后果自负。

然后，“战斗小组”找华东局要了一架专机，专机落实后，他们向成都方面打去电话，十分兴奋地告之“货已到手”，请派车于当天下午到机场接人。

当天上午，“战斗小组”押着李井泉、程子华等一行，乘专机飞返成都。

李井泉被秘密押往四川大学内的重庆大学八一五挺进纵队驻地关押，第二天凌晨，“挺进纵队”用汽车将李井泉押往重庆。

1967年2月19日，重庆造反派八一五派在驻军支持下夺权后建立的“新生红色政权”——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在长江边珊瑚坝召开了数十万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批斗大会，李井泉被武装押送到会场，挂上黑牌，批斗后用卡车押着在城内主要街道游街示众。以后他又遭到过几次批斗。4月底，李井泉被押回成都交给红卫兵成都部队批判。

从4月初到5月初，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主持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关于解决四川问题的一系列会议。5月7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正式点名批判了“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严厉申斥他们“长期以来，把四川省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等人坚持执行刘少奇、邓小平

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布撤销李井泉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从此，李井泉遭到了更加猛烈的批判斗争。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头上的“走资派”罪名才被推翻。

---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 国）                    〈cnd-cm@cnd.org〉

---